

中国新文艺大系

—·—

1937 — 1949

民间文学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37—1949

民间文学集

刘锡诚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6·北京

(京) 新登字17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民间文学集/刘锡诚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8

ISBN 7-5059-2149-5

I . 中… II . 刘…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②民间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 1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6) 第07677号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37—1949]

民间文学集

刘锡诚 主编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7×1092毫米 16开本 48印张 6插页 965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

ISBN 7-5059-2149-5
I·1520 (精) 定价：83.00元

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周 扬
总 主 编	陈荒煤
副 总 主 编	冯 牧
常务副副总主编	李 庚
总 编 委	陈荒煤 冯 牧
	李 庚 张 庚
	王朝闻 许觉民
	江晓天 张 炯
	樊 骏 李景峰(执行)
	潘光武(执行、兼编辑部主任)

《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各分集主编

小 说 集	严家炎	音 乐 集	吕 璞
诗 集	公 木	美 术 集	冯光钰
散文杂文集	田仲济	摄 影 集	李树声
	蒋心然	书 法 集	胡志川
报告文学集	穆 青	杂 技 集	王景芬
民间文学集	刘锡诚	评 论 集	傅起凤
戏 剧 集	葛一虹		林忘浩
电 影 集	程季华		李葆琰
曲 艺 集	罗 扬	理论史料集	徐迺翔
	郭潭封		

— 1 —

中国新文艺大系主要工作人员

编辑部成员	潘光武	谢郁彦	阮培宝
	原 苹		
出版负责人	李景峰	胡元义	
装帧设计	张慈宁		

出版说明

(一)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七十多年来，中国的新文艺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深刻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它是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编纂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拔萃本总集，目的是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研究、总结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衍变的规律和历史经验，提供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我们也期望这部总集，能帮助广大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选择精英，统览各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从中汲取教益；并能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的新文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二) 《中国新文艺大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我国新文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概貌。

(三) 《中国新文艺大系》按历史时期分辑，由近及远地编纂出版。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八二年底，共分五辑：第一辑〔1917—1927〕；第二辑〔1927—1937〕；第三辑〔1937—1949〕；第四辑〔1949—1966〕；第五辑〔1976—1982〕。若干年后，将续编以后的各辑。

《中国新文艺大系》每辑按文学艺术的门类和体裁分集，各辑的分集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所有分集均有主编撰写的导言。

(四) 这次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为第三辑，共十五集。其理论部分包括评论集和理论史料集；文学部分包括中、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杂文集、报告文学集、民间文学集；艺术部分包括戏剧集（话剧、戏曲、秧歌剧、歌剧）、电影集、曲艺集、音乐集、美术集、摄影集、书法集、杂技集。儿童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本辑不列分集，其优秀作品收入有关文学集中；优秀长篇小说目录仍收入理论史料集中；有关舞蹈集的一些资料，已作为附录收入第四辑〔1949—1966〕舞蹈集中。

本辑的编纂，仍然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各分集的主编；仍然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衡量，同时考虑某些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代表性，强调尊重历史、反映历史，强调质量第一，做到精选、严选、拔萃与代表性相统一，全面地反映抗日战争至新中国建立前文艺的概貌。

香港、澳门、台湾作家的作品，因资料不全，难于精确选拔，暂不收录，俟条件具备，另行增补。作品编排一般以首次发表时间或所据版本的时间为序，少数分集分类后再按时间先后排列。个别作品收入本书时，编者对一些文字错讹作了必要的订正。

（五）《中国新文艺大系》的编纂，是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文艺界的大力支持，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的。工作中我们还得到有关部门及海内外专家、读者的关心和支持，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并恳请惠予教正。

中国新文艺大系编辑部
一九九五年七月

直 言

刘 锡 诚

发韧于1918年的中国歌谣运动，由于一大批开拓者的披荆斩棘，奔走呼号，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地度过了二十个春秋，终于在布满顽石和荆棘的荒原上，开出了一条依稀可见的小径，结束了它的步履艰难的草创时期。

战争改变了一切，一切为了战争。“七·七”事变之后，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使形势急转直下，先是平津失守，华北沦陷，继而把战火烧到了南京、武汉、长沙，接着粤西告急，全中国被投入了战争的深渊。

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的知识界，包括从事民间文学的人士，发生了大分化。有的卖身求荣，当了汉奸；有的不堪做亡国奴的境遇，逃亡到了大后方；有的投笔从戎，上了打击侵略者的前线；有的毅然奔赴延安。尽管战乱不已，生活颠沛流离，仍然有一大批热爱中华本土文化、中国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学家、作家、文化工作者，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拓的道路，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出版、调查、研究以及推广事业，并且做出了足以彪炳青史的可喜成就。当我们认真地研究了这段时期的材料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937—1949年，无论是调查搜集还是学术研究，都堪称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抗战时期搜集工作概貌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散布于各地的民间文学报刊就陆续停刊了。抗战爆发后，复刊一年零三个月的北大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也在出版三卷十三期之后于1937年6月底停刊了。沦陷区的许多学者、文化人纷纷逃亡到南方，平津成了文化空白。也有些多年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研究的人士，上了前线，无暇再顾旧日的行当。传统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不大可能再像前一时期那样活跃，相对处于消歇阶段。但是，不少爱

国文化人士（包括民间文学专家）为了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奴化教育，利用其他书刊不易出版的环境，纷纷将手头上已经掌握的民间文学作品编辑出版，以此向中国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进行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教育。这些琳琅满目的民间文学出版物以乡土教材的面目流行于世，不仅能在读者中唤起爱国家、爱家乡的强烈情感，起了思想教化的特殊作用，而且为民间文艺学这门年轻的学科积累了资料。

沦陷后的北平和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了不少民间文学的普及读物。如北平的民间社、曲园出版社，上海的正气书局、国光书局、儿童书局、大方书局，等等，出版了不少这类图书，它们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这些朴素而又充满机智和趣味的民间作品，给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以正义、乡情的启迪与生活的鼓舞。

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来考察，特别值得提出来加以注意的是方明整理、上海元新书局出版的《民间故事集》和作家王统照编、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的《山东民间故事》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分别出版于1937年的3月和8月。其中所收录的民间故事，都是流传于山东境内的，以胶东各县为主。这两本集子的特点是，所有故事都是由搜集者直接从民间搜集记录而来，首次公开发表的，而不是像有些集子那样从现成的选集中转载过来的。《民间故事集》中的27篇民间故事的搜集者是曾宪敏、林秀容等多人，可能是某地中小学的教员。根据受义所撰序言来看，方明所以编选这部民间故事集子，是为了向儿童提供一部上好的读物。“根据我们的思想，情感，想象能力和兴趣”选辑出来的“好食品”，能够“领导我们从幻想到真实，从迷信到真理，从个人的享乐主义到大众的集团里去；让我们往创造、革命的路上走。”^①在这本故事集中，收录的大部分是社会生活故事，如两兄弟型故事《小狗耕地》、《继母》、《呆女婿》、《可恨的嫂嫂》等，这类故事具有明显的道德指向和训戒意义。也有相当比例的幻想故事，如《牛郎和织女》、《凝翠晓钟》、《聚宝盆》、《姑姑鸟》等，以其瑰丽诡谲的幻想和曲折迷离的情节折射着俗凡的人生。在这些故事中，有些是其他毗邻地区或省分也有的故事，起码其骨干情节（母题）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也有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如《皮狐子娘》）。

《山东民间故事》的编者王统照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又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长篇小说《山雨》问世以后，遭到国民党反动书报

^① 方明《民间故事集·序》，上海元新书局1937年版。

审查机构的查禁，人身安全也面临危险，遂于1935年出游欧洲。1936年回国后由上海回山东诸城老家住了半个月，他的在当地当小学校长的侄子王志坚呈给他一部民间故事集请他过目，后他带回上海，挑选其中28篇编为一册由陈伯吹主持的儿童书局出版。如果说方明在编选时只是重视了作为儿童精神食品的价值的一面，作为作家兼学者的王统照在他编的集子里，则不仅第一次向读者展现了胶东几个县的民间故事，而且触及了民间故事学的一些普遍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这28篇故事是由小学生从他们的父母兄弟中间记录下来的，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加工和曲意文饰。因此，从这些作品中透露着普通老百姓的朴素的民风和对世事的见解，乍看起来，也许会觉得那不过是些幼稚糊涂的观念，只要稍加深究，就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真理。

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等民俗学家创办《民俗》杂志和民俗传习班，在南方接过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与歌谣研究会的传统。但到1933年6月13日出版第123期之后就休刊了。事隔三年，由杨成志先生主持复刊，1936年9月15日出版了复刊号（1卷1期）。复刊后的《民俗》一改前期《民俗》的风格，一般不再发表民间作品，偏重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和调查报告。抗战爆发后，中山大学迁至粤北坪石，研究所组织了广东北江瑶人考察和乳源瑶人考察，其调查报告发表在《民俗》第1卷第3期（1938年？）和第2卷第1—2期合刊（1943年5月）上。这两个考察是民族考察，对瑶人的民俗文艺较少注意，因而没有民间作品发表出来，实在是一桩憾事。复刊后的《民俗》第1卷第4期（1942年3月）发表了梁瓯第的《西康的民歌》，第2卷第3—4期合刊（1943年12月）发表了张嶽坡的《岭南的客家民歌》。仅此而已。曾经在中大和杭州主办民俗期刊的钟敬文，抗战爆发后不久，就到前线去做宣传工作，撰写报告文学，后来又转到学校执教，没有机会再重新捡起他曾执著迷恋过的民间文化了。他自己在一篇文章里说：“抗日战争时期，前期因为主要在广东前方从事救亡工作，写了许多报告文学、抒情诗及带火药味的文艺短论，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论文，记得只写过《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后期在粤北中山大学教书，也年年讲授民间文学课，但是，很少写作关于民间文学的论文。”^①

抗战期间，民间文学搜集与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了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

^① 《民间文艺谈叢》编后小记，见《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第23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

不久，长沙又面临敌机轰炸，复又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上海的大夏大学迁到了贵阳。中央研究院迁到了昆明，后又到了四川南溪的李庄。由于时局的变化，西南四省——云、贵、川、湘集中了一大批文人学者，加上当地的文化界人士，形成了雄厚的学术力量。他们从文艺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当地的若干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调查与搜集。西南地区的民间文学调查与搜集，较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所进行的个人的搜集来，不仅范围有了较大的开拓，而且学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种在调查的基础上的搜集，以其卓著的成就，揭开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史上崭新的一页。

较早进行这类民俗文学调查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民族学家凌纯声和芮逸夫。1938年出版的史语所的期刊《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公布了他们1933年5—8月在湘西的凤凰、乾城、永绥三县边境地区对苗人进行民族调查时所得的几个洪水神话。^①1947年又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该书上册为调查报告，下册为民间文学作品。凌、芮二人把他们在湘西调查采集的故事分为四类，即：第一类——神话；第二类——传说；第三类——寓言；第四类——趣事。其实这第三、四类就是一般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其中一部分是他们在湘西亲听苗人讲述随时记录下来的；一部分是他们的苗族助手乾城的石启贵、凤凰的吴文祥和吴良佐从当地苗族讲故事人记录下来的。他们说，在记录这些故事时，严格地遵循着民俗学和语言学的科学要求，为了读者读得顺，他们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正，绝未改动原来的意义。

在长沙立足未久的临时大学，一方面由于敌机的威胁，一方面为了更大的计划和使命，于1938年春天决定迁址昆明。一路乘火车赴广州，转香港，经海防由滇越铁路去昆明。一路则由二百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向昆明进发。大家不愿虚此一行，加入步行团的教授和学生，分别成立了各种沿途考察的组织，民间歌谣组就是其中之一。闻一多先生是参加步行团的四位教授之一，他担任民间歌谣组的指导，而且沿途对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服装、山歌、民谣、民间传说亲作调查。当时跟随闻一多采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马学良回忆说：“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顿住处，也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青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他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谁也看不出他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学

^① 见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和《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38年。

者，他兴味十足地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他喜欢去茶馆酒楼闲坐，听素不相识的老乡论古道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亲自指导同行的原南开大学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民歌民谣，到昆明后整理成《西南采风录》，并亲自为之作序。”^①

从长沙至昆明三千三百华里，路经大小城池三十余座，村镇不计其数，旅行团走了68天。刘兆吉在闻先生指导下沿途采风，采得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歌谣二千多首。他每到一地，在田畔、牧场、茶馆、街头，向遇到的农夫、儿童们搜集，沿途访问中小学、民众教育馆、教育局和其他文化机关，并请他们代为搜集，从街头、墙垣、庙宇墙壁上的涂写中搜集，并且搜集当地印行的各种歌谣印本和抄本。这本《西南采风录》中所录的歌谣，不仅有在三千多里广袤地区都有流行的情歌（七言四句式），而且也有即席编唱的“抗战歌谣”和“民怨”歌谣，强烈地反映出民心的背向，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却可以作为民众敌忾的见证。朱自清也为此书作了序，他高度评价了刘兆吉的采风成果：“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来作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②朱自清指出了他采风的特点是：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初期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前辈们不同，那时一方面行文到各省教育厅，请求帮助，另一方面提倡私人采集，这些人的采集，大概是请各自乡里的老人和孩子，由于是同乡，不存在语言和习惯的隔膜。而刘兆吉的采风，却是在外乡、外民族，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更多。但他同时搜集了湘、黔、滇一部分地区的民歌，不仅对认识民歌的源流与变迁，而且对认识社会风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由上海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对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该校于1938年春设立了“社会经济调查室”，旨在调查与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与经济，一年以后又改名为“社会研究部”，把重点转向了社会状况和民俗材料的调查与研究上。由社会学家吴泽霖主持的这一机构，曾先后到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匀、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以及广西的三江、融县等调查社会状况和民俗资料，并主编《社会研究》（以《贵州日报》副刊形式发行）期刊，出版“贵州苗夷研究丛刊”：《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吴泽霖调查记录了贵州花苗的兄妹婚神话、大花苗的古歌《洪水滔天歌》、八寨黑苗的洪水遗民神话以及炉山等地的短裙黑苗的洪水神

① 马学良《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见《楚风》1982年第2期，长沙。

② 《西南采风录·序》，商务印书馆1947年12月初版。

话^①。陈国钧到下江牛带深山中的生苗（少与外界交往的一支苗族）进行社会与民俗调查，用国际音标记录了三则生苗的人祖神话，其中有一则是诗体的，长达488行，是演唱时记录的。据作者说，这三则生苗的人祖神话，是最为普遍的三则，“散布于生苗区的每个角落”，内容结构虽然有些出入，但却都是从同一个“母胎”衍化出来的。而这个“母胎”就是：“古时候曾经有一次洪水泛滥，世上人类全被淹死，只有两个兄妹躲免过。后来洪水退却，这对兄妹不得已结成夫妻，他们生了一个瓜形儿子，气极把这瓜儿用刀切成碎块，撒在四处，这些碎块即变成各种人了。^②”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对贵州各民族各地区歌谣的搜集成绩尤为突出，仅陈国钧一人就搜集到几千首歌谣，涵盖黑苗、花苗、红苗、白苗、生苗、花衣苗、水西苗、仲家、水家、侗族等，他从中选择出一千首编成《贵州苗夷歌谣》厚厚的一册^③。其他人员，如吴泽霖、杨汉先、张少微、李植人在搜集歌谣方面也各自有所贡献^④。

对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调查，搜集了大量材料，对我国民间文学事业贡献殊多的，还有当时也迁到昆明、1940年后又迁到川南南溪县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的一批学者。原为杭州艺专的学生，后成为中央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李霖灿，1939年也在抗战促成的大迁徙中来到了昆明，抱着绘画的目的去了丽江的玉龙山，被纳西族（当时译名通用么些族）东巴经里的民间故事所吸引，改变了终身的事业。他在纳西人和才的帮助下，搜集了几十个东巴故事，其中包括几个创世神话。《敦和庶的故事》是关于人类始祖某莉敦孜的神话，曲折地反映着人类早期的氏族斗争的情景。全国解放后搜集翻译的《董述战争》或《黑白之战》，与此是同一神话的异译。《洪水故事》是人类在洪水之后再传的神话。这些纳西族（么些族）的传说故事的搜集与翻译，大大推动了对纳西族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社会的认识与研究。可惜的是，这些材料在二十年之后才在台湾发表^⑤。

① 吴泽霖《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见《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文通书局1942年8月初版，贵阳。

② 陈国钧《生苗人的人祖神话》，见《贵州苗夷社会研究》。

③ 《贵州苗夷歌谣》，文通书局1942年初版，贵阳。

④ 参阅李德芳《三、四十年代我国社会学者对西南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见《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北京。

⑤ 李霖灿《么些族的故事》，见《民族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68年，台北。其中第二部分为《么些族的故事八篇举例》。

与李霖灿搜集纳西族传说故事的时间相近，1940年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芮逸夫与傅斯年的研究生胡庆钧从临时所址李庄出发赴川南之叙永县鸦雀苗居住地进行婚丧礼俗田野调查，搜集到仪式歌多首，对于研究鸦雀苗的礼俗和口头文学有相当价值。可惜的也是拖了二十年才与读者见面^①。当时也在李庄的，还有先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马学良，由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合并，他也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了。他长期在云南彝族地区进行彝语学习和彝族民族调查，与彝胞朝夕相处，搜集了大量彝族的民俗、信仰以及神话、传说和故事。他所搜集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如《洪水》、《八卦》、《山神》等都发表在方国瑜等人创办的《西南边疆》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边政公论》等期刊上。由于他是语言学家，又在西南联大大迁徙中跟随闻一多采过风，他所搜集的彝族口头文学，都是从讲述者口中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的。他崇尚马林诺夫斯基的学说，反对平面地搜集，主张立体地搜集研究，所以他搜集口头文学又同搜集研究彝族的宗教、信仰、民俗结合起来。

上海之江大学史学教授徐松石从1927年起到1940年间数次到广西桂北、左右江流域、黔西、黔中、黔南、广东粤江流域旅行调查风土人情，研究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源流，便中也注意搜集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他搜集到的桂北苍梧一带流行的《竹王的故事》以及手抄歌本《盘皇书》（忻城县瑶人）和苗民谱本，具有相当高的民俗学和历史学价值^②。

西南地区当时还有一些对民间文学感兴趣的外地来的文化人和当地的文化人，对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首先应提及的是诗人光未然。1939年1月他率抗敌演剧第三队由晋西抗日游击区赴延安；3月间写了著名组诗《黄河大合唱》，经冼星海谱曲后广为流传，成为抗日军民的一支号角。皖南事变后，被迫从重庆流亡缅甸；1942年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里教书。他根据彝族青年学生毕荣亮提供的讲述，记录、写定了彝族支系阿细人的民间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于1944年2月由李公朴主持的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先鸡”是阿细语，即“歌”的意思。全国解放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将其收入“民间文学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改为

① 芮逸夫、管东贵《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23，1962年台北。

② 见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年8月初版；《泰族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1946年6月初版。

《阿细人的歌》。光未然是诗人，为了把这部民间叙事长诗翻译、写定，曾经研究彝语语法，在“发音人”（讲唱者）的帮助下，搜集神话传说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其他口传材料。他说，他在写定时，是忠实于原作的，只是在某些不连贯的地方，才作某些修补。这一点，他在解放后为新版本所写作的序言中作了交代。

当时也在西南过着流亡生活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学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参加路南县政府编修县志的工作，在路南读到光未然整理的《阿细的先鸡》北门版后，就想找到“先鸡”的原文。他找到了光未然记录整理《先鸡》的“发音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再次记录了这部叙事诗，这就是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印行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袁家骅在他的国际音标记音、阿细语——汉语对译、汉语意译本的第一章里写道：“光未然先生写定的汉译，给我们介绍了这部长诗的内容，但是他凭歌者的解释，对于‘原文’难以兼顾，所以译文在润饰上有卓越的功绩，而于原文的真相和细节也许不能完全传达。歌词并不太固定，歌者所凭的是记忆和兴会，所以光译和我的记录并不能完全符合，更不可能句句符合。^①”这种情况在民间口头作品说来是极其正常的，由于歌词是不固定的，有些地方甚至由歌者即席编唱，多有增删。况且光未然搜集记录于1942年，写定于1943年，袁家骅记录于1945年下半年，他们的共同的“发音人”（讲唱者）毕荣亮已经由一个中学生变为一个24岁的成熟青年，他接触了汉人的新思潮，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交，尽管同是出自他一人之口，自然会有所变异的。全国解放后的1958年，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和昆明师范学院1955级的部分学生，组织了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在弥勒县又搜集记录了一种《阿细的先基》的新的异文，主要的“发音人”（讲唱者）是盲歌手潘正兴^②。新异文当然与光未然的写定本是不同的两种文本。光未然在1952年底为《阿细人的歌》新版所撰序言中说：“《阿细人的歌》是一部活的口头文学，在实际演唱的场合，往往要随着演唱的环境和对象发生若干变化；添加若干灵巧的诗句，并在一唱一和的互相酬答中发挥若干新的创造。毕荣亮君告诉我，如果让他回到自己的山村，找到适当的对唱的对象，他可以连唱四天四夜也唱不完。^③”这是行家的话，自有真理在。《阿细人的歌》今后也还可能有新异文被记录写定。光

① 袁家骅《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第4页，中国科学院出版，1953年6月北京。

②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阿细的先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中国民间叙事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③ 《阿细人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朱然和袁家骅的劳动为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科学记录和写定打下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从大西北的兰州，辗转来到重庆的张亚雄，是一名新闻记者。他把他十年来在作新闻工作的同时，从牧童、脚夫、小工、车夫、雇农、学生、排字工友以及各阶层的文化人和朋友中间搜集起来，珍藏在贴身之处的一部《花儿选》的原稿，带到重庆，于1940年由青年书店出版。花儿是西北广大地区流行的民间文艺形式，但此前并没有人去搜集记录过，《花儿选》的出版使我国出版史上有了“第一部”。该书是搜集者由手头积累的二千首花儿中挑选出来，共计六百首，实属洋洋大观！这部民歌集的特点是，在每首花儿的后面附有注释，对于读者对花儿及其社会民俗背景的理解，是极为有益的。

抗战期间，西南地区有一些期刊，如昆明出版的《西南边疆》，成都出版的《康导月刊》和《风土什志》等，都比较注重发表民间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对于西南地区形成我国民间文学运动的中心地位，起过一定的作用。《西南边疆》是方国瑜等人于1938年10月创办的，以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的那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为后盾，陆续发表了一些云、贵、川的民俗、神话论文和民间作品，除了上文提到的马学良外，楚图南的《中国西南民族神话之研究》长文，白寿彝的《关于咸同滇乱之弹词及小说》，都是在这家期刊上发表的。《康导月刊》是西康省的刊物，1938年9月25日创刊，几乎每期都有西康和西藏两省藏族的民俗、民间故事和民歌披露于版面。王铭琛用五言译的《康藏情歌》就是在该刊分期连载的。陈宗祥译的藏族伟大史诗《格萨王传》序幕之一、序幕之二，发表在该刊第6卷第9·10期合刊上（1947年1月出版）^①。《风土什志》创刊于1943年9月30日，发行人樊凤林，编辑有谢扬清、雷肇唐、萧远煜、裴君牧、杨正苾，其宗旨在于弘扬西南地区的乡土民俗文化，团结了四川的一批作者，其中包括作家李劫人。该刊是一本32开的杂志，文章篇幅不能太长，因此常常发表一些各地的民俗随笔、民间故事和民歌，趣味性较强，是一份大众读物。但也发表过像《格萨王传》这样价值很高、篇幅不算很短的作品的片断。

抗战时期各地的文艺刊物，一般很少发表民间文学作品，间或也能看到一些，主要是抗战歌谣，能够配合抗日，鼓动人民抗战的。如1938年5月在武汉创刊的《抗战文艺》，1940年在成都出版的《战时文艺》等，大致都是这种情况。究其原因，这大概是因为办文艺刊物的作家们，对民间文学不熟

^① 据信该刊在出版这一期后，就停刊了，所以《格萨王传》后面的章节未能读到。确否，因北京资料不全，不做定论。

悉，同时战局的发展又要求文艺期刊予以配合，以鼓舞军民的士气，因此发掘民间文学遗产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自己的范围之外了。还应当指出，某些中国作家脱离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看不起他们所创造的民间文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抗战时期民间文学运动的特点

抗战时期的民间文学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发展时期，无论从文化思潮的角度，还是从理论成就或工作实绩的角度来看，都呈现着若干显著的特点。

(一) 民间文学被当作民族精神、民族传统的体现和民族间血缘关系的纽带，而得到阐发和强调，成为抗战时期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乃至整个民间文学运动的主旋律和重要特点。抗战爆发，在民族和国家处于危亡之际，民族的不屈精神在民众中空前高扬，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强，在这种情势下，平日被掩盖着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民间文化，上升为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的体现者，民族间血缘文化关系的纽带。这种情况的出现，不只是在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凡是处于民族危亡关头的民族，其发自普通老百姓的肺腑的民间文学，往往成为体现该民族不屈精神和牢固民族传统的表现，尽管不一定是最唯一的表现。爱尔兰民族曾长期被英国人所统治、所奴役，但爱尔兰人从不屈服，从不放弃自己民族的传统，他们的弹唱诗人就成为在英格兰统治、奴役下爱尔兰民族反英格兰的传统的主要代表者，他们的民歌、民间叙事诗、传说，就成为该民族传统的最宝贵的遗产。芬兰民族在十二世纪前后曾经沦为瑞典和俄国的牺牲品，生活于民族遭受蹂躏的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们的鲁诺(民歌)就成为他们斗争的力量和慰藉，后经隆洛德(Elias Lönnrot)连缀整理为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成为芬兰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的集中代表。可以断言，民间文学是与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不灭的。抗战时期的中国，情形正是如此。

日本侵略者以“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口号作掩饰，先是建立所谓“满洲国”，继而推行华北自治，企图在军事侵占之下对中国蚕食。但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各地区是以悠久的文化血缘而凝聚在一起的，即使东北亚文化也与大陆文化、与西南地区的文化有着血脉相联、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的政治阴谋和霸权企图都是无法得逞的。民俗学家、神话学家们在我国南方民族中间发掘和记录的一些神话，证明与发达较早的中原地区的古代神话有若干相似或相通之处，后者在历史的变迁中已经变得残断不全、形迹模糊了，而前